



世界减贫史上留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 曹伟

创新开路应于法有据

当前,浦东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系列“大招”背后是肩负创新开路的新使命。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既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也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应及时通过立法进行确认,以此来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累计有127个创新事项及“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等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市复制推广,有效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在尚不能对改革开放创新举措进行全国立法的前提下,浦东新区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将这些开放创新举措予以固化、总结,形成更规范、更标准的制度经验,为下阶段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提供支撑和保障,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浦东样板。

同时,过去一些开放创新措施在全球化、法治化的视野下更像政府文件的宏观安排,缺乏细致性和应变性,有时还可能对扩大开放、参与全球竞争产生某些不利影响。通过探索地方立法,将重要的改革开放举措纳入法治轨道,可以将宏观举措细化为可操作、可执行的具体规范。之后,经过地方立法实践的检验,再将规范性文件上升为法律文件。这样一来,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提升竞争底气。

从“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的定位来看,浦东新区可在地方立法上作进一步探索和尝试,重点应围绕自贸试验区尤其是新片区建设,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上予以突破。

第一,在贸易规则方面,应积极主动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当前,中国不断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正在由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制定者加速转变。浦东新区应以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为契机,按照国际高标准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通过地方立法增加先行先试国际先进规则的重大举措,把一些难点、焦点问题,包括通关合作、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争端解决机制等,放到浦东新区内加以探索,加快与国际先进规则接轨进程,切实提高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度。

第二,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服务业扩大开放是浦东新区的特色之一。尤其是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服务业开放措施累计37项,落地项目超过2900个。但是,服务贸易规则仍整体缺乏统一性。同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12大类服务部门和143个服务项目之中,我国还有不少服务行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浦东新区可以针对性地探索立法,为下阶段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法律依据保障。

第三,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金融开放、资本项下可兑换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点任务。金融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系统风险会给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影响。因此,金融创新需特别注重风险防范,建立健全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机制与应对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在这方面,浦东新区可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地方立法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制度和指标体系,构建金融风险应急机制和临时性资本管制机制等。

第四,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条例》第39条规定“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和个人实施约束和惩戒”,但如何具体实施约束和惩戒没有规定。今年8月,浦东新区获评国家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区),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立法,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以此来解决受限领域不清问题,建立惩罚性赔偿惩戒等制度。

第五,在政府治理方面,浦东新区围绕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先行区的目标要求,不断探索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其中,很多方面需要地方立法予以确认。例如,根据中央关于“监管要在创新方式、科学有效上下功夫”的指示精神,浦东新区建立以“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为内容的政府综合监管机制,形成事中事后监管闭环。目前,“六个双”监管已在浦东新区21个监管部门实施,涉及许可和检查的108个行业(领域)全覆盖,30多万家公司市场主体信息纳入监管平台。下一步,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进一步规范措施制定、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这也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政策制定如何更加科学

■ 赵刚印

执政党要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关键之一就是制定符合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政策。

但在现实中,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性的缺失,使得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理论化、抽象化、缺乏操作性等现象不同程度地显现。

比如,有的政策规定太过原则化,既不利于具体执行,也不便于人们遵守;有些制度虽然面面俱到,应有尽有,但内容过于宽泛、界限模糊,缺乏针对性、实效性。

科学的政策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但领导干部在座谈会上听到的、上报材料里看到的信息,有些是经过层层过滤的,真实信息还能留存多少?完全依据这些渠道获取的信息去制定政策,很可能与实际有所脱节。只有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使政策更加切合实际。

对此,除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外,最重要的是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代表能广泛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家集中论证与有关部门最终决定,从而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效率性有机结合起来。

科学的政策出台后,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有效督察与科学评估十分必要。对此,有必要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机制,不能大而化之凭感觉,而要有科学的数据支撑,借助民意调查等形式,不断提升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还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减贫的根本途径是发展。中国在加强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的减贫实践与经验属于世界。今天,中国正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遗余力,更加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视野和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但今天消除贫困正面临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特别是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世界经济增长形成重大威胁和巨大破坏。

自由贸易是促进全球繁荣的基础。现在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不但破坏了一系列国际贸易规则,更可能迟滞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是世界减贫事业的“逆潮流”。

未来15年至20年,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坚定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全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为推动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我们坚信,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更加繁荣,中国与世界的必将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给全人类带来进步、富裕和繁荣。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说,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战略中,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做到脱贫脱到点上、扶贫扶到根上;坚持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这些经验铸就了中国式减贫的奇迹,在世界减贫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牵头搭建多边合作平台,推动世界同步发展,加快全球减贫进程,更加有效地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特别是,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更多国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中、南亚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内容涉及港口、铁路、公路和桥梁建设等。据估算,“一带一路”如果得到全面落实,可使3200万人摆脱贫困,可加快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减少贫困。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

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是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需要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从而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因此,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

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立足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在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继往开来、创新发展,不断破解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扶贫工作科学总结与理论提升,形成了精准扶贫理论和精准扶贫方略。在此进程中,不仅将21世纪中国消除贫困的伟大事业推向新阶段,而且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必然需求,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应有之义。只有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赢得民心。

另一方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境界。

以往的粗放式扶贫方式存在底数不清、目标不准、效果不佳等问题,很难把经济发展成果同贫困人口共享,难以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工作呈现新局面。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直接瞄准目标人群,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可

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效能

■ 王建宁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不少资金囤积金融系统体内进行循环套利,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通道变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不了应有的效能。

特别是,作为经济毛细血管的小微企业,由于金融政策传导机制被阻塞,得不到政策性“金融雨露”的浇灌,在“差一口气”的关口生死徘徊。

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防止“脱实向虚”?

第一,正本清源,使金融回归正道。

作为原则,金融业应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通过支持创新驱动实现利益

让渡,从而带动金融业打牢基础、稳健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功能发挥,使泡沫型投机行为有所收敛。

同时,要配合货币政策,积极疏通贷款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设法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在实体经济急需资金投入的时候,能提供利率适当的资金。

第二,下定决心,从科学考核入手。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核标准偏重收益率排序考核,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建立资金收益考核标准,引导信贷工作和资金投放转向高盈利领域,自然就会驱动从业人员寻求愿意出高价的项目以及愿意付出高利息的客户。

同时,隐形驱离低产出行业的存量资

金,致使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供给不足、科创行业金融供给严重匮乏。走向“制造泡沫”的实质性异化,又反过来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效。

第三,协同共进,下大力气疏通。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支持银行更多利用创新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金,引导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支持;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战略研究专家)

管理理论和实践怎样走出“丛林”

■ 吴涛 姚晓光

中国作为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管理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论是文王演泽的八卦易经、先秦诸子的百家学说,还是“得半部即可治天下”的论语,成就众多军事霸业的孙子兵法,都蕴含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不过,真正把组织管理上升为一门正式社会科学来研究,还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且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处于所谓的“丛林状态”。

“浮躁病”和“时髦症”

实践证明,在观点各异的茂密“丛林”里,更易患上“浮躁病”和“时髦症”。

比如,有的组织对管理理论认识不全、不深,实施经验主义学派目标管理法,将目标责任指标分解到各级员工,却不愿授予员工相应权力。

又如,对员工有充分授权,却没有提前建立严格风控制度。

还如,有的组织对自身定位不清,但凡业内流行的管理理论都要跟风实行,结果是“昨天坚守传统主业、今天推进蓝海战略,昨天强调刚性制度、今天突出柔性文化”,迷失于所谓新理论、新思路之中。

组织管理理论之所以处于“丛林”状态,缺乏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正是对组织管理本质问题等基础理论认识不足的后果。

一是组织管理具有极强实践性。特别是,早期组织管理研究者大多为一线管理人员,更加注重解决具体问题,而对管理本质的抽象研究不足。

二是组织具有异常复杂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中,像组织这样历久而弥新,综合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法学、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之大成仍难能得窥其全貌的研究客体并不多见。探寻组织本质问题要

求研究者具备“无情的渊博学识”。

三是人的认识具有渐进性。人们对事物认识是“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持续深入的辩证发展过程。组织管理研究同样如此,需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扬弃,才能无限逼近真理,达到新的认识境界。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加速迭代,消费者需求快速升级,经济环境日新月异。对组织而言,过于强调适应环境就会失去“主心骨”而陷入被动的状态;顽固僵化拒绝变化,则会被市场无情淘汰。优秀的组织不仅会依据环境变化趋势,提早进行布局和创新,及时调整战略制度,而且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持发展战略定力。

从“应然”转向“实然”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文化管理理论是以构建组织文化为抓手,围绕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的根本目标,在充分借鉴各个管理学派的基础上系统研究组织管理制度体系规律和方法的学说。

理解文化管理理论,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强调“人”具有极端重要性,但“效率”才是管理的根本目标。

二是强调组织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地位,但决不轻视产权、治理、战略、管理体制机制、业务操作规则等正式制度的作用。

三是强调学习型、权变的思想,任何组织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实施文化管理,但具体内容和形式并不固定。

管理理论和实践存在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如“只有进行文化建设的组织才存在组织文化,反之则不存在”,如“相比以农民工等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型组织,高学历员工较多的研发型组织更需要文化管理”……

实际上,任何组织都存在组织文化,区别在于自发形成还是自觉构建。例如,劳动密集型组织未必适合“自由、民主、开放”的文化取向,但可以培养强调“纪律、服从”的文化氛围;对于经济需求较高的低技能劳动者,则可以建立“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成就面前不止步,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催人不断奋进。

■ 周文

党的领导与政府有为

按照西方的逻辑和传统认知,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积贫积弱国家,既缺乏西方理论描述的发展腾飞所需的基本要素,又没有按西方发展路径选择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出现发展奇迹的,更不可能实现全面脱贫。

事实证明,这一认知和结论是严重的误判。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不但扭转了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而且逐步解决了困扰中国和世界几千年的贫困问题。中国的减贫实践精彩、生动,并具有世界意义。

看待今天中国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看待脱贫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西方的理论和模型进行演绎。以华盛顿共识为例,它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所以要解决发展问题就必须取消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一药方治理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结局越来越糟糕。

中国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脱贫道路,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回顾实践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减贫实践的伟大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政府的有为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具体来看,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减贫的根本保证;坚持以发展解决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是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综

重树师道尊严 岂能一味效古

■ 黄波邨

教师是为培养人才、振兴教育而冲锋陷阵的“战士”,教师既是古代社会分工的产物,又是现代化、专业化发展的体现。教师传播知识与文化、推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不仅提高物质文明水平,而且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因此,教师职业既神圣又伟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师道尊严这一价值理性与经济社会的工具理性存在某种冲突,传统的师生伦理逐渐被解构。在个别地方,师生关系甚至出现了异化——老师变成了“老板”,师生间是金钱关系甚至“雇佣关系”;还有些老师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在学业、学风上故意放水……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师生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学生良好品性的塑造。

重树师道尊严,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不是一味效古,而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不同的要求。

首先,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及尊重。

当下,教师的准入条件较高,既需要一定学历,又要有教师资格证,还有试讲等考核环节。因此,教师自身素质总体上应该说并不差。

教育既要传承,也需创新。教师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面对纷繁复杂的教情,探索并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或手段势在必行。作为“统帅”的校方、督导或教育管理者,则应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及尊重;全社会尤其是家长也要提升认知,信任绝大多数教师的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和教学水平,尊重教师在授业过程中给予的学业评价。

如此,方能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具有较高认同感,从而激发更大的工作热情、投入更多的工作精力。

其次,正确认识教师工作的特殊性。

教师的劳动属于脑力劳动,相较于体力劳动,需付出更多的学习和时间成本,包括知识更新、准备教案、教学传输、释惑答疑、批改作业等。同时,教师不仅是心智长期高投入的一种职业,而且是为国家建设培养和输送各类人才的,理应获得相匹配的收入回报。

只有正确认识教师工作的特殊性,理解教师职业的崇高与无私,才能真正尊重他们的劳动付出,认可其劳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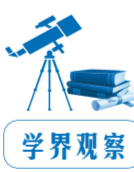
最后,大力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一个职业有无吸引力,显著的标准包括优秀人才是否愿意从事这一职业、职业中男女比例是否合理。调查数据显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堪忧,直观的特征便是男女教师比例失衡。改善这一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有必要重视教师软实力的建设。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当下,教师的聘用、考核及晋升等评估体系普遍量化,但教师的行为示范即师道却很难量化,往往只能隐于学生内心或形成口碑。

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最终还是要凭借教师的教学艺术及人格魅力,而非仅仅依据听评课节数、教改科研成果等硬指标。因此,相关评估应科学、客观、全面,给予教师一个相对宽松安宁的环境,潜下心来,以涵养其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界观察